

一九三九年二月启者烟草工人罢工

归档时的案卷号：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卷内共	份	张	保管期限
-----	---	---	------

卷 内 目 录

案 卷 号

[illegible]

关于一九三二年二月

启东烟草公司工人罢工斗争的核实报告

一九三二年二月，启东烟草公司党支部在奉天特委的领导下，发动了工人为增加工资、恢复福利待遇的罢工斗争。

对这一罢工事件，沈阳市卷烟厂、大连机车厂党校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期间进行过调查，积累了资料，并整理了综合材料。近年来，有的部门在出版人物传中详述了斗争史实，有的个人撰写文章发表在《沈阳日报》和《大连日报》上。由于这次罢工发生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不久，在工运史上有特殊意义，引起研究工运史的同志重视，但对罢工时间、经过、结果的说法不尽一致。

今年，我们为把史实搞清，史料立准，在过去调查的基础上，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了核实工作，既查阅了中共满洲省委有关档案，又搜集了过去积累的所有资料，通过鉴别，提出怀疑问题，然后多次访问当事人，并组织了座谈。在核实过程中，省市档案馆、党校、省图书馆，市卷烟厂和沈铁机务段党委，大连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和机车厂党校，哈尔滨市总工会和党史征集办公室等单位都给予了大力支持，提供了可贵资料。最后经过研究分析，去伪存真，综合整理罢工斗争史实资料，作为研究和编写地方党史、工运史、地方志参考。

沈阳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

一九八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附：《一九三二年二月启东烟草公司工人的罢工斗争》

一九三二年二月

启东烟草公司工人的罢工斗争

一九三二年二月①，启东烟草公司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和恢复福利待遇举行罢工斗争。这次斗争是我党所发动和领导的。

启东（前名英美、联合、大英）是世界上著名的烟草垄断企业之一。上世纪末进入上海，一九〇七年在沈阳设厂。这个厂资金雄厚，有长期在殖民地经营工商业的经验。在沈设厂后，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名目繁多，手段毒辣，除廉价使用中国劳动力外，其主要方法：一是奉票日益毛荒，规定每年只三次调整奉票作价，使工资增长幅度赶不上奉票跌落幅度，工人实际收入越来越减少，难以维持最低生活；二是各种罚款制度，迫使工人每日劳动十二到十四个小时，但应得的劳动报酬，往往去掉无理扣罚，所剩无几；三是劳动条件恶劣，工人要受侮辱性的搜身，非人待遇，难以忍受；四是每月按工人工资百分之五留存“押金”，只有在工人不发生违反“厂规”的情况下，这笔钱十年后才能归还本人，企图用这种办法约束工人②。

残酷的压榨，激起工人的反抗。一方面由于他们身受压迫的痛苦，另一方面又由于他们当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上海和天津，与关里罢工工人有着天然联系，受其影响，所以不断地同英国资本家进行斗争。从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一年间，至少曾进行过十一次罢工、怠工斗争。

这些斗争，一直是处于自发状态。

沈阳在一九二五年开始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启东烟草公司一九二七年就有过党员活动③，一九二八年奉天临委派人作群众工作④，一九二九年满洲省委把该厂作为重点之一，派人进厂⑤。一九三一年五月，在奉天市委领导下，建立了党的地下支部⑥。同年九月省委要求市委“准备烟厂的斗争发动和领导”⑦，十月又派金聚坤、小妹妹（名字尚未查清）两名党员进厂⑧。经过一段宣传教育工作，提高了工人群众的觉悟，在党支部周围团结了一批男女青年工人，形成了一支骨干力量。又在这些骨干中发展了两名党员，壮大了党组织力量。青年团、妇女工作也得到了开展。在这期间，满洲省委金伯阳、刘芳（王立功）等同志对工人运动给予了指导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市内工商业萧条，歇业倒闭者甚多，大批工人失业。启东烟草公司变本加厉的把经营损失转嫁工人，致使工人生活极度恶化。党支部按照省委的指示，发动工人进行了“奉票改现”的斗争，取得了胜利⑩。由于这一斗争，符合当时工人的经济要求，鼓舞了工人斗争情绪，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继这次斗争后，英国资本家更加紧了对工人的压迫剥削，每年仅有一次增加工资的规定也给取消了。不仅如此，为拆散工人斗争骨干力量，又把当过工人代表的王有余、刘岐山、张贵元三人先后调离卷烟部，有的去切烟丝，有的上通班当力工。工人群众对这种报复行径极为不满。党支部因势利导，在奉天特委同意下⑪，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发动一千三

百多名工人举行了罢工。

二月二十七日，党支部书记孙星五和党员金秉坤、小妹妹在北市场福安里（金秉坤和小妹妹的住处，省委旧址）一起研究罢工的发动工作，分析了工人与总办之间矛盾的激化程度，认为应当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决定以工人要求调回代表为导火线，组织以增加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罢工斗争。当时三人作了分工，男工由孙星五负责，女工由金秉坤和小妹妹负责，分头找活动分子发动全厂工人。当日晚间，在北市场华丰里工人王志贤家由孙星五主持召开了活动分子会议，有倪永升、刘岐山、申金儒、王志贤、董义田、小乔（女工）等人参加，推选了王志贤、刘岐山、申金儒、小乔为代表。在会上提出了罢工条件：调回卷烟部三名工人；增加工资三分；准许在厂内吃早饭；不准打骂和侮辱女工。为防止工贼破坏，由倪永升、范玉成、申金儒三人负责执行纠察队任务。会后他们组织了会武术的青年工人张贵元、董义田、戴宝珍、徐俊岭等二十多人，随时准备应变。但因事态变化，没发生任何冲突。

活动分子在工人中个别串连，散发传单，发动群众。传单大致内容：“反对资本家剥削工人！”“打倒工贼，反对工贼出卖工人弟兄！”“坚决罢工到底，不胜利决不复工！”还写了一份“告工人书”，内容与传单相似。女工写的顺口溜说：兄弟姐妹请你听良言，咱们作工的，苦的真可怜，早晚上下班，不见太阳只见天，作活要包件，迟压半月钱，作好算一件，不好算“白填”，工厂紧压榨，工头欺负咱。她们还以“姊

妹团”名义警告工贼不准破坏罢工，“不听劝阻者，定打不容”。通过活动分子的宣传发动工作，激起工人愤怒情绪，鼓舞工人斗争热情，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正在酝酿待发。

二月二十九日上午，历次斗争走在前列的卷烟部工人开始行动起来。他们首先采取怠工方法同厂方交涉。工人代表王志贤、申金儒、刘岐山找卷烟部大工头陈振波，提出了要求条件，没有结果，随即又到公事房同买办王筱山交涉，仍遭拒绝。下午全体一百五十多名工人全部停车，离开三楼，举行了罢工。当即有五六十人跟随代表涌到公事房，工人在门前示威，代表在总办公室向二办（英国人，外号白毛）郑重提出罢工条件，并严词警告如不答复，决不复工。二办的态度非常^强硬，拒不接受，对代表威胁说：“中国工人多得很，你们不干没关系，都把‘铜牌’交出来算帐”（交“铜牌”就是开除）。二办的答复，更激怒了工人，在代表的号召下一致表示“不答复条件，坚决罢工到底！”这时已近下午四时，工人就一齐离开工厂。在这期间，二办为破坏工人罢工，令工头张荣昆去营口招工，企图把罢工工人全部开除。工人得知消息，斗争情绪开始有些不稳，有的害怕被开除。范玉成当即站出来作了群众工作，他安慰大家说：“不要怕，他若真去招工，我去对付他。”安定了工人斗争情绪，增强了工人斗争信心。这事又很快地传到张荣昆的耳朵里，他深知这些会武术小伙子们的厉害，没敢妄动，二办的招术遭到破产。当天晚上，孙星五在王志贤家

召开了工人代表会，决定第二天早七时全厂一致行动，举行总罢工。

三月一日早晨，厂内外贴满了罢工传单和标语，一号门前贴出了“告工人书”。北大门外早已聚集五六百名女工，等候和男工一起同英国资本家斗争。活动分子在人群中宣传鼓动：“同胞们，我们受够了外国人的气，再也不能忍受了，要团结起来，向外国资本家斗争！”她们三五成群凑在一起，诉说姐妹们受压迫的苦衷，表示决心斗到底，群情振奋，势不可当。在男工方面因决定罢工时间过早，有的正出家门走在路上，都没有到厂。时钟打过七时后，上班时间已过，没人进厂，全厂总罢工宣告开始。

英国资本家破坏罢工未成，又贿通警察十分局在这天早晨出动警察镇压。在一号门东墙外，警察逮捕了正在贴传单的董义田、刘岐山和王志贤等三人，并从王志贤身上搜出几张传单，把他们一同押进十分局。这时，男工尚未到齐，工人邢景芳听说警察抓走了三个人，就急忙找到工人代表申金儒报信。申金儒又马上联络了十八名男工到十分局请愿，要求放人。在十分局的一间办公室里，局长齐祝平（齐恩铭的儿子）先令警察“把王志贤带上来”，在请愿工人面前审讯。齐祝平问：“你们的党部在哪里，有多少党员？”王志贤回答：“不知道，只知道要求增加工资。”齐祝平说：“不说，我枪毙你！”任凭齐祝平再怎样追问，王志贤都以“不知道”或默不作答顶住了他的淫威。在王志贤被带回关押后，请愿工人向齐祝平提出了释放被捕工人

和罢工要求。齐祝平说：“你们不要受共产党煽动，回去好好干活，要求的条件我可以和总办商量。”在女工方面，群众的斗争情绪正在高涨，突然听说工人代表被捕，无不愤怒，在金秉坤、李雅卿等人的带领下，一齐赶赴十分局营救。上午十一时左右，十分局后院陆续聚集了三四百名男女工人，喧哗吵嚷，要求放人，答复罢工条件。持枪警察严阵以待，戒备森严，齐祝平出面进行所谓的“调停”。当他在工人群众面前说到“他们（指被捕工人代表）是共产党宣传员，都得枪毙”时，工人毫不退让，顿时哗然，女工代表小乔高喊：“他们是共产党，我们全是，都把我们关起来吧！”齐祝平见威吓不成，态度缓和下来，又说：“你们和他们不一样，都要回去干活，你们一上班，我就把他们三个人放出去，要求的条件可以和总办商量。”齐祝平这番巧言欺骗，瓦解了群众斗志，愤怒情绪被平息，团结力量被松懈，工人受骗，离开分局。二日部分工人复工；三日全厂工人复工；四日工人代表获释，但即被开除，罢工条件没有实现^⑫。王志贤回到家中，生活非常困难，孙星五到家安慰，有些女工还凑钱资助，申金儒帮助找到工作。

这次罢工表明，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获得发展；工人群众在英国资本家的残酷压榨下，自身痛苦加重，必然奋起反抗；工人举行罢工，英国资本家破坏未成，贿通警察局镇压也是必然的。但是，由于党的领导无力，缺乏强有力的罢工组织，当罢工发动起来，突然遭到

镇压和欺骗，群众情绪涣散，骨干无所适从，难以坚持团结斗争，是罢工不能取胜的根本原因。罢工后，党的力量削弱，骨干积极性受到挫伤，工人运动一度处于消沉状态，英国资本家借机加紧压迫工人群众。后来，经过党团支部的艰苦工作，群众斗争情绪才有所转变，于同年十二月十日党又领导卷烟部一百七十多名工人，为缩短加点时间举行罢工，取得了胜利。

注 释

- ①罢工日期有两种说法，一说是一九三一年冬，一说是一九三二年春。根据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咸湘同志报告》、当时党支部书记孙星五（现名孙玉魁）和工人代表申金儒、刘岐山等人的回忆以及《盛京时报》一九三二年三月二日、八日的报道断定，此次罢工是发生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持续到三月四日结束。
- ②四条主要压迫剥削手段，见孙玉魁：《“九。一八”事变前后启东烟草公司工人罢工的情况》和申金儒：《忆启东烟草公司工人罢工的情况》的回忆材料。《咸湘同志报告》中也有所提及。奉天商工会议所：《奉天经济二十年志》第六九五页载有实行“押金”制度，并承认是企图约束工人不至作出“过激”行动的办法。
- ③见满铁人事课：《南满洲に於ける劳动争议》（昭和三年度）附录第五页。

④见《奉(天)临委临字报告第二号》，一九二八年三月五日。

⑤见《奉委通告第一号》，一九二九年三月五日，第七页、《满洲省委给中央并转全总党团信》，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九日，第二页、《满洲省委工作计划》，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第二页、于培贞的回忆。

⑥见孙玉魁、何成湘的回忆。

⑦见《满洲省委检查奉天工作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九月八日。

⑧见孙玉魁、金德贞(即金秉坤)的回忆。

⑨摘自《唐辉辰回忆金伯阳在沈阳地下活动的情况》、大连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大连工运史讲话》，一九八三年印刷，第一七九页。

⑩见《CY满洲省委报告》，一九三一年三月九日，第一至二页，孙玉魁、申金儒、唐辉辰的回忆。

⑪关于党领导这次罢工问题，有的说是由满洲省委常委金伯阳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亲自到沙子沟工人宿舍发动工人”，当警察局逮捕三名工人代表后，“工人代表在沙子沟召开会议，金伯阳同志讲了话”，“到会的工人同志，再次受到鼓舞和教育，增强了斗争的信心”，“之后，金伯阳又同大家一起研究怎样营救被捕的工人代表”(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满洲省委烈士传》，辽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五月第一版，第八七至八八页，《沈阳日报》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一日)。据调查证实，这种说

法有误。当年同金伯阳在一起工作过的唐辉辰、北满特委委员于成文、北满特委候补委员黄吟秋的回忆，在罢工期间金伯阳同志正在哈尔滨工作，因此他不可能亲自参与发动和领导。另据当时支部书记孙星五、党员金秉坤和工人代表刘岐山、申金儒、倪永升、范玉成等回忆，酝酿罢工曾取得奉天特委的同意；三名党员在北市场福安里研究罢工的发动工作时，没有金伯阳参加；七名活动分子在北市场华丰里王志贤家研究罢工条件和召开工人代表会，金伯阳也没有到场。这些调查资料所得，与《成湘同志报告》的主要情节基本一致。无论从实际罢工情况来看，或是从罢工准备工作来看，可以肯定金伯阳同志没有参与罢工的发动和领导，准确地说是由奉天特委领导的，全部罢工是由党支部通过活动分子和工人代表进行的。

- ⑫对罢工的结果，有的说“终于答复了工人的三项要求”，“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见《满洲省委烈士传》和《沈阳日报》）。根据党内文献和当事人回忆，这一说法不符史实，事实是罢工没有达到目的，三名代表获释后均被开除。当然，这次罢工就反帝意义来说，对全市工人反对日、英帝国主义的斗争是起到了鼓舞作用的。

